

作者：Pierre Salama¹

翻译：陶维旭，袁野

由内需带动的经济发展成为拉美国家对抗经济危机的办法：
一个有动员性的幻想？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强劲增长后，八十年代的危机深深的伤害到了拉丁美洲。只是在十四年后才重新达到 1980 年的 GDP 水平，贫困率在这十年中的增加使得拉美国家二十五年后才重新找回 1980 年的水平(Jimenez 2010)。社会不平等现象在拉美，除极少数国家外，是非常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一个累退式税收政策，一个跟欧洲比起来微薄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还有一个至今还是很低的贸易开放度(除了墨西哥和一些中美洲国家外)，2008 年的经济危机断送了一个从 2003 或 2004 年开始的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

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是，2008 年的这场危机不是来自于拉美各国的内部弱点，它在发达国家中心爆发然后向四周扩散。这样看来它更接近于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危机。但是与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同的是，虽然这场危机很严重，但就目前情况看来它相对短暂，因为 2009 年末经济复苏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经济周期中的一个时刻和整体趋势混淆，尤其是对待这场结构性危机。在目前国际经济危机现状下，只要国际经济整体结构没有重新构建，我们就必须对目前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保持质疑。虽然复苏很脆弱，但是如同八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一样，这场危机的【经过】展现的是一个生产结构的转变，虽然现在还观察不到，但是它将导致治理方法与方式的变革。

这篇文章主要是想探讨一下，在经过了几年来不断增长的开放度后，一个以公平分配和国内市场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能不能真正的给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希望以国内市场的概念取代九十年代华盛顿共识带来的外部市场，这确实有点像幻想，因为极度的社会不平等和利益冲突会成为税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因为这将使上层社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看似幻想的措施却已经在巴西和阿根廷开始初步实施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决定的逆周期经济措施完全不同于前些年汇率危机时实施的源于华盛顿共识的紧收措施，当时的措施把这些国家

¹ 巴黎十三大教授，邮箱地址：salamapierrealbert@yahoo.fr，个人网页：<http://perso.wanadoo.fr/pierre.salama/>

推进了萧条。这些源于实践凯恩斯主义的新政策主要目的是支持内部需求，它们同时造成了初级产品出口顺差的下降，现在我们可以承认，这些措施到 2010 年初减轻了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成本。

在以下几方面，这些逆周期政策是 2000 年以来拉美一些国家政策的继续：社会不平等的小幅度改善，更加积极的社会政策，经济增长的复苏。我们能不能因此认为是国际经济危机造成了这些已经开始了的趋势的加速，或者说这只是个初步摸索，一旦经济复苏的假象被信以为真了，我们就会重新回到一个稍加改变的以前的【社会排斥性发展模式】。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对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主要拉美国家工业组织网络发展的影响，第二部分我们将通过对国家经济开放度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严重性的分析，得出建立一个依靠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可能性。

1. 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

1.1 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个独特的工业化模式 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

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以前，这三个国家的工业一直从属于当时列强对初级原材料需求的国际分工。由于他们的工业化会影响到列强国内的就业和社会结构复杂化，这将直接质疑列强们的霸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列强对拉美国家工业化的阻挠和因此而来的拉美诸国国内市场的不足。这种统治关系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30 年的经济危机，尤其是英美两国霸权交接而有所改变。这给拉美国家工业化带来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1930 年的经济危机给发展中经济带来了很深重的打击。由于国际收支状况受损，初级产品出口严重下降，这些国家的进口能力受到重创。危机的长短没有被政治家预测到，因此在每个国家起到的影响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深度变革而是继续从属于国际工业分工，另外一些为数不多的国家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危机后，开始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工业化】(CEPAL)。这个【没有想到的工业化】是一系列原因的结果：

A 因为出口经济而建立的微薄的工业基础组织。(比如专门用于修理运输的蒸汽机车作坊还有由于港口和城市的建立而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

B 由于商业关系和工薪关系的推广而出现的国内需求，

C 通过使用本国货币购买未能出口囤积的部分商品起到支持出口商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部市场紧缩的延续使得这些国家进行了一次以独特方式进行的工业化：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以轻工产品进口替代产生的良性循环促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随着进口替代步骤逐步扩大。由于轻工产品资本密集度较低，因此产生了大量就业。劳动力一部分来自外国移民，但是更多的是进城工作的农民。这些农民的就业大大推进了经济货币化进程。这一进程带动了越来越大的【工人内需】。经济货币化替代并超过了海外市场拉动经济的作用。这样看来这是个良性循环。经济由内需带动，但是和传统凯恩斯概念不同的是，这时内需是由经济货币化拉动的而不是工资的增长。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 1930-1940 年间轻工产品进口替代中这一关键点。

三十年代的结构性经济危机造就了这一新的增长机制，CEPAL 管它叫作【内部拉动】。这样看来经济危机推动了新老经济模式的整合和替换。

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即推动了这个没有想到的工业化也催生了特殊的政治体制。工业的进步改变了社会结构，带来了各阶级之间和各阶级内部的新的利益冲突。随着轻工产品进口替代模式的不断弱化，这些冲突也越来越尖锐。首先进口能力没能增长或者增长度很有限，外加国际经济危机的继续。其次进口结构越来越僵硬，本国生产不能足够进口的中间产品由于两个原因变得越来越困难，首先，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其次，由于不存在能够集中资本的股票市场，大量中小企业不具备集资投资能力。在此情况下唯一的可能就是依靠政府支持了，但不是因为政府应该支持它们就真的这样做了，这还要看社会矛盾的结构与解决方式。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出现了 P ron, Vargas, Cardenas，他们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直接投资把经济发展模式从轻工产品进口替代转变成重工产品进口替代。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过于脆弱和由于没有金融市场而缺位的私人企业。(Mathias 和 Salama, 1983)。

只要政治条件存在，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原材料行业就可以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前一个发展模式留下的一些不可逾越的阻碍就在一定时间内被超越了。

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给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008 年的经济危机能不能也带来相似的影响呢？

1.2 2008 年的经济危机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不同。因为经济金融化在此次危机中起到的作用要超过其它所有因素。今天我们已经对经济金融化对发达国家中工作收入的缓慢增长和居民债务问题的影响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既不能因为在发达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压制工资增长就把 2008 年的危机归类为需求危机，因为消费借贷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我们也不能把这次危机归类为投资过剩危机，因为在大量发达国家投资率和空闲生产力是很低的。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是贸易和金融国际化对工资和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的结果。贸易全球化和来自亚洲低工资国家的外部约束使得发达国家和拉美新兴经济体内部工资和生产率脱钩。金融全球化使得企业内部出现了更能够提高近期盈利能力的新的组织模式。除了一些收入急剧上升的企业主管外，利润与工资间的分配越来越对后者不利。在利润内部，来自金融的利润与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如果正如我们所想这次危机是结构性的，那么就不要再期望一个周期性的复苏来超越引发危机爆发的原由。只有通过国际金融构架的深层改革和设立新的(考虑到生产的伦理条件与自然环境条件)国际贸易规则才能够真正的从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从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给拉美带来了新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复苏来看，我们可以认为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会给拉美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经济复苏的长短和它本身的意义保持冷静。会不会是在一个下降的大趋势中的一个小的上升周期呢？或者这真是一次持久性的经济‘脱节’：结构性危机在发达国家继续延伸，而拉美新兴国家将进入一个可持续性发展，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前提？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如同三十年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针对利益冲突，尤其是分配冲突的政策性对策。

拉美国家或多或少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开放程度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传导渠道’，这些渠道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危机传播效应。(WTO-OECD, 2009 ; OECD, 2009 ; IMF,

2009))²。2008年的经济危机很深重(他对不同的拉美新兴国家造成了5到10个百分点的经济倒退)(Salama 2009, 2010),但是很快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复苏。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市场的发展和来自于亚洲经济体(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印度)的外部需求。然而如果发达国家再一次发生经济危机,如现在某些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出现问题,拉美国家的经济复苏就会出现。它将或多或少,根据贸易开放度的不同,出口产品,金融国际化程度和外国资本存量流量(债券,股票,直接投资)³,净外汇储备总量⁴,给新兴国家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这不光因为外部需求萎缩,国际间流动性和出口贷款的枯竭,更主要的是新兴经济国内市场整合需要一定时间,也就是两个危机中间这段时间。它越是长,抵抗外部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大。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认为它在近期发生的概率很低。我们的假设是,只要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发达国家将继续以低速发展。我们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速度较慢和金融风波随时可能发生的假设下来研究拉美国家出现以内部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的可能性。

2. 历史会重复吗?

二十年代,拉美国家出口份额在国际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比经过二十年不断开放的今天要高。我们普遍认为二十年代是市场自由化的年代而且推断出当时的经济要比现今经济更国际化。这样认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两个时代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货币化程度。拿当时的发达国家而言,大部分人居住在乡村,这里的自产自用品程度是相当高的,在当时的拉美国家就更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额和GDP的比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因为它们是两个已经货币化的值之间的比,而大部分个人生产品是在非货币化渠道中流转的,因此没有被计算到GDP中去。而这个比在货币化基本完成的今天就比二十年代有意义。现如今国内市场已经存在,我们不用再去重新建立它。如今唯一扩大内部市场的方法是提高劳动收入和建立再分配机制。而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完成这两点只有在国家保

² 在很多新兴国家,银行资产中高风险资产数量并不多。在这次经济危机初期流动性枯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际投资者为给本国母公司(企业或者银行)提供流动性将资本撤出造成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国家货币相对美元的贬值。此后,由于新兴国家股市的高回报率而重新流入的资本并没有带动信贷增长,所以国有银行要替代私有银行来完成这项任务。

³ 经济危机的传导针对每个国家而不同,主要是取决于它们国际化的程度,我们可以使用很多综合指数对此进行衡量。很多国际组织,比如IMF,进行了这类衡量,但是我们不敢确保结论的准确性。比如OECD曾经表示在2009年,墨西哥受经济危机打击程度要低于其他国家,现在看了这离现实相去甚远。

⁴ 这是很重要又很少被人分析的一点。外汇储备可能来自贸易收支,也有可能来自资本收支。只有来自前者才是真正的储备,后者则会随着经济状况而波动,很可能因为撤资行为而突然减少。比如在2008年末。Bradesco (2009年02月24日)。

持相对竞争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然的话进口产品就会替代国产产品。与三十年代不同的是，依靠发展国内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还需要同时保持竞争力，除非假设我们重新回到保护主义，而这完全可以利用生产伦理和生产环境或者诸如【购买国货】等宣传口号来使其合法化，我们现在已经观察到类似动向了。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国内市场拉动经济的可能性，一是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二就是社会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国际一体化和货币化的世界。

2.1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比以往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的对外贸易

我们可以选择两个角度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第一是会计角度，第二就是经济机制角度，包括涟漪效应。

从会计角度看，计算要从净出口入手。出口被看作是对经济有正面影响而进口则被看作有负面影响。因此，尽管某国经济可能比较开放，但对外贸易对该国经济可能没有正面影响。这也就是说当国际收支为负时。很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经常被当成例子来表现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在中国，2000到2008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平均贡献度是10.2%，也就是说如果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2%的话，那么这个贡献度只有1.1个百分点而投资和消费贡献度则分别为5和4.1个百分点。不可否认的是出口贡献度随着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净出口年平均贡献度从2001到2004年的5%到了2007年的20% (Goldstein et Xie)(2009)⁵。

会计角度和经济角度所谓的贡献度是不同的，尽管一国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微弱或者为负，在经济机制角度看有时贡献度是很大的。出口虽然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有时它对经济一点贡献没有，尽管在很高的经济开放度的情况下。比如墨西哥和韩国，前者经济增长不是由出口带动的而后者则是。

墨西哥近几年和阿根廷不同，它的国际收支是逆差。墨西哥出口结构是由10到15%的石油出口组成，剩下的我们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完全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另一半是出口到墨西哥国内市场的产品。最近三十年来开放度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Maquilladoras»手工组装低附加值产品出口。这

⁵ 以南韩为例，在同一阶段，它的净出口贡献度就比中国要高(28.6%)，与新加坡相仿(27.3%)，德国由于国际收支极度顺差(64%)而美国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则为-4.3%。

样的工业集群效应也很低(Palma, 2005), 对经济增长贡献微弱。GDP 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增长缓慢, 乘数效应低下(Ibarra, 2008)。

在韩国, GDP 增长是由出口带动的,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复杂。D.Rodrik 1995 年的研究结论是, 与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理论正好相反, 韩国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不是来自出口和经济开放。设备进口增长速度要快于出口。进口主要由中间产品和设备组成, 它们的增长反映了投资的增长, 其实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这些投资的一大部分投向生产出口产品(外汇的来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投资率增加导致进口增加, 进口增加再导致出口增加, 只是到最后国际收支才变成顺差。以上这些通过经济机制角度分析出来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 尤其是进口高端设备, 都是政府鼓励在本地生产出口产品零配件的工业政策。这一政策解释了投资和中间品进口的增长。这是和墨西哥完全不同的一点。出口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伴随它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业基础: 通过对出口行业的直接投资和对生产这些出口产品必要的中间品的简介投资。从凯恩斯角度看, 投资乘数效应与出口正面效应的总和超出了进口的负面效应。

韩国的例子可以用在很多亚洲国家上, 通过收入分配手段带动内部市场不代表我们不重视国外市场, 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借助哲学家的一句话就是两个独立但相关的个体。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常忽视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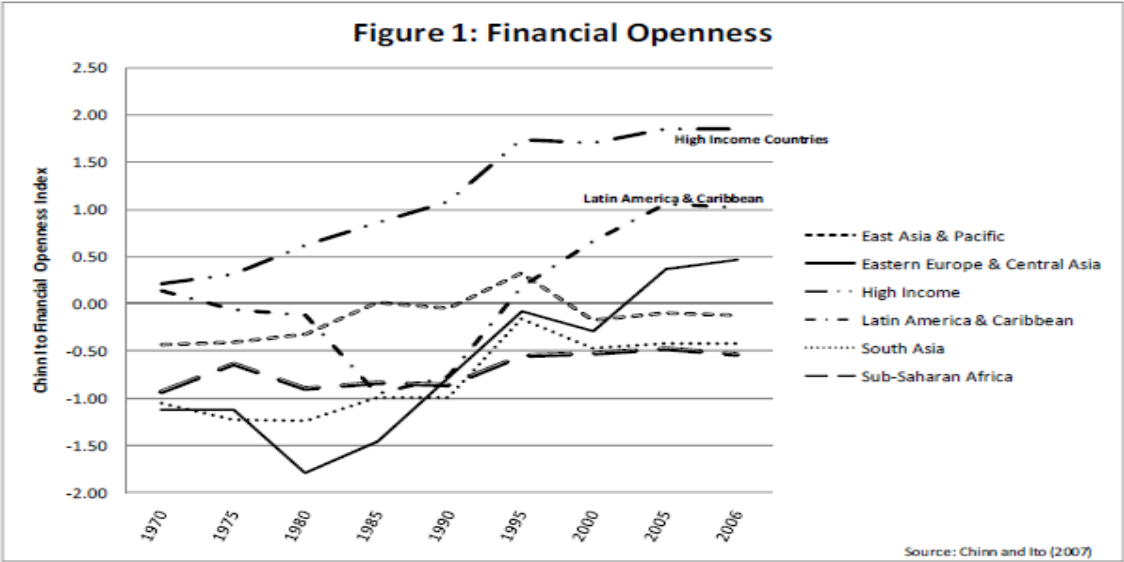
然而, 与我们有时所想的正好相反, 拉美国家近二十年来贸易开放度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其实是有限的, 拉美新兴国家并没有经过对外贸易大开放的过程。除了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些小国家外, 巴西阿根廷等大多数国家保持了它们在国际出口中的份额⁶。国际出口总额在这一时期增长速度比全球GDP增长快两倍。确实, 这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了, 但只是以国际平均水平再进行。

比如巴西的开放度从 1990 年的 11.7% 增加到了 2004 年的 26.9%, 但是它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却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1975 年到 2005 基本维持在 1.1%(Kliass ; Salama , 2008) 。尽管后来有一定增长, 但那也只是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与此相反的是, 中国的出口增长却比世界平均水平

⁶ 在N Birdsall Birdstall和Hamoudi在 2002 年对Dollar和Kraay2000 年的研究报告的批评中指出, 这一指数针对只出口初级原材料的国家(大多为不发达国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指数中, 分子也是波动性也是很大的, 这就意味着这个指数本身波动性就很大。用这个指数来衡量经济开放度并找到它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科学实质性的。

要快得多。1975 年时它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与巴西相近(0.9%)。但是后来增长速度越来越快：1990 年是 1.9 %，2000 年则为 3.9%，到了 2005 年就到达了 7.4%，目前是 8.9%(Instituto economico do desenvolvimento industrial he WTO-OECD)。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化要超过巴西。确实巴西，阿根廷对外开放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开放。

与亚洲国家相反的是，拉美国家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是相当高的。见下图⁷：



金融开放度并没有使银行资产中充满高风险证券化的金融产品。拉美国家受到的打击主要还是来自流动性枯竭，比如危机初期大量撤资行为。拉美银行虽然没有像欧美银行一样需要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清理，但是很多拉美私立银行还是收紧了银根。投资和出口贷款越来越难以获得。然而针对整体经济的贷款却没有大幅度下滑，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通过国有银行加大了对整体经济的信贷并推出了很多政策和对利率进行强行压制(对汽车，住房，出口等贷款施行补贴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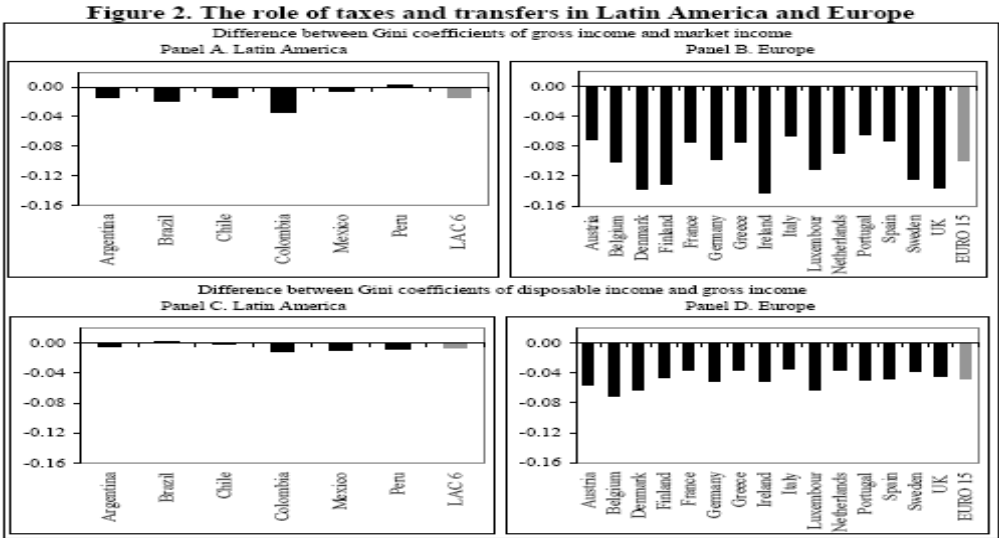
这一系列政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型国有银行的存在，比如巴西 BNDES，相反，如果这样的银行不存在，这些政策是很难推行的。

2.2 强大的社会不平等是希望通过建立内部市场拉动经济复苏的最大阻碍

收入不平等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非常普遍的现象。在 2000 到 2008 这几年间，这个现象在很多国家得到了改善 (CEPAL 2009 ; Lopez-Calva , Lustig 2009 ; Hopenhayn 2009) 除了三个国家以外。这一

⁷ 请看Galindo A, Izquierdo A和 Rojas-Suarez L(2010, P12)。如今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很多，比如Titelman D和Perez-Caldentey和Pineda R 2009 的文章。

变化是重要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劳动市场运行机制的改变，社会福利的加大，税收政策的累退性质也比以前稍有减弱，人口的减少和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工作。根据Lopez-Calva, Lustig 2009, 后两点的作用相当有限。针对每户人家成年人数量对 2000 到 2008 年的社会不平等下降起到的作用来看：巴西为 6.6%，阿根廷为 8%，墨西哥则为 10.3%。不平等的改善主要来自工作条件的改善，比如工资，而很少来自于工作以外收入的增加⁸ (阿根廷为 26% 墨西哥为 15.1%) 除了巴西以外(45.2%)。说得更准确一些，在巴西低收入者工作收入的改善要高于高收入者工作收入的改善。5%工作收入最高群体的收入和 50%工作收入最低群体的收入比从 1993 年的 14.3 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13.5，同样，在 5%和 25%群体之间的比从 23.6 下降到了 18.6(Salvatori Dedecca 2010, p16)。这些数据可能会是我们非常惊讶⁹。其主要原因就是最低工资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国有部门退休金¹⁰，另外就是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变化(Salama 2007, 2008)。这里我们主要要注意的是拉美社会财富再分配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下图是从OECD 2008 年Goni, Humberto-Lopez 和 Serven 等研究中提取出来的。



⁸ 这一类的内部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社会再分配，租金，和资本收入。
⁹ 我们需要注意两点，在发达国家最富有的 0.01% 或 0.1% 的群体的收入增长非常快，资本收入(利息，红利)的记录系统很不完善。
¹⁰ 在很多国家我们可以观察到退休金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关系。后者的增长会带动前者。而社会政策(在拉美国家社会政策的概念是教育，社会再分配，社会保障：退休金和医疗)总的来说是比较薄弱的，虽然在巴西的某些国家有大幅度增长。据Afonso和Dain 2009 年的研究，只有三个国家阿根廷，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在 1985 到 1990 年间社会支出超过 GDP 的 13%，在 2002 到 2007 年间则有 9 个国家(包括巴西的 24.4%) 但不包括智利。墨西哥在第一阶段要低于 9% 而在第二阶段上升到了 11.2%。

他向我们表示社会财富再分配对财富集中度并没有很大影响，当我们把拉美和欧洲总收入(包括再分配) 和市场收入(Market income 不包括再分配)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这种再分配在欧洲起到的财富均衡作用要大于它在拉美起到的作用。

当我们把可支配收入 (包括再分配，直接税后)与总收入(直接税前，包括再分配)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税收对缩小收入不平等同样在欧洲起到的作用要大于拉美¹¹。根据OECD，市场收入GINI与可支配收入(包括再分配，直接税后)GINI之间的差 2006年在拉美是 2，在欧洲则是 20。

结论很简单，再分配和税收前收入集中度在欧洲和拉美之间的差只有 4 到 5 个点，税收和再分配后的差距则为 20 到 25 个点。平均看来，GINI 在拉美从 51.6 下降到 49.6，在欧洲则从 47.6 下降到 28.2。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 Celso Furtado 的研究以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社会不平等和低社会福利是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Salama 2006Chap1)。相反不平等的略微下降和社会支出的增加给 2000 年代前几年经济发展和内部市场很大激励。

结论

对拉美国家的未来走势进行预测，我们就不得不分别来看近十到十五年每一个国家走过的不同的路线。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有很多相似的特点：收入及其不平等(巴西要高于阿根廷)，这些不平等稍有下降，较低的对外贸易开放度(除了墨西哥)，初级资源出口占总出口份额在巴西，阿根廷重新回到较高水平，出口高端工业产品能力较低(巴西这方面能力要高于墨西哥和阿根廷)，2000 年以来除阿根廷以外，其他国家有实际汇率增长趋势。它们也有各自走过的不同路线：巴西和墨西哥在 2000 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低。2004 年起巴西增长开始加速，阿根廷重新找回亚洲经济增长速度。在 2009 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降但低于墨西哥下降幅度。巴西社会不平等在 2000 年代下降要快于阿根廷和墨西哥，社会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在巴西阿根廷不断加大，在墨西哥却停滞不前(Alonso, Dain, *op.cit*)。

¹¹ 如果这项研究用的是简介税收的话，那么差距可能会更大。(CEPAL 2009 ; Gomez 和 alii, 2008)，因为简介税比直接税更有累退性，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缴纳，这就是它与直接税收的不同之处。

通过这些发展趋势和 2003-2004 年开始的增长速度加快，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一个不以初级原材料出口而是以国内市场带动的经济发展新机制就已经就出现了呢？

在这些国家面前是一个十字路口，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出台的逆周期的经济政策¹²和经济复苏可以成为到达新的发展机制的跳板。这样做它们只是在强化 2000 年代隐约出现的一种趋势，如同在 1933-1934 年一样，拉美国家将 « 利用 » 这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减缓收入不平等和加大内部市场对经济复苏的贡献力度。

但是随着资本大量回归拉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复苏，支持内部需求的困难(因为这有可能提升劳动成本)，使得某些希望关闭 « 经济危机括号 »，然后回到以前那种排斥性发展模式的政治家份量越来越重。自从 2008-2009 年大贬值以来，资本的回归给这些国家的货币带来了升值的压力，这将对外国投资者有利而不利于出口工业产品(以美元计算的劳动成本将会增加，这将超过中间产品和设备进口价格的下降)。我们可以想象墨西哥最有可能回到这条路上，因为它的出口基本上是针对美国与加拿大的而且外国势力在它的银行体系里也是很强大的。相反如果危机再起的话，则有可能迫使墨西哥继续推行逆周期政策和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而且这将使比索贬值达到减少劳动成本的效应。

继续支持内需的政策最有可能在巴西阿根廷施行，但是阻碍也会有很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不平等过高而且下降速度缓慢。从资本增值角度看，针对很多产品而言，巴西自身的人口总量(高于阿根廷)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使它拥有足够大的市场。但是只要金融业和它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得不到控制，这个大市场就不足以拉动可持续经济发展。针对人民生活的惨状，提高最低工资是应该的，但这是不够的。累退性税收制度要得到改变，但这将强化近几年来已经蠢蠢欲动的利害冲突。

昨天，在三十年代，依靠经济货币化和工业化，内部市场得到了大踏步式的发展。今天唯一能够拉动内需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这样做就会重新回到被国际分工整合到初级原材料出口的位置上。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选择，他会使明天更脆弱。这样的选择就是选择回到三十年代以前的时期...奇怪的历史轮回。

¹² 逆周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支持国内需求，可以是税收政策(减税)，货币政策(人为维持低利率)或者财政政策(增加最低工资，退休金社会再分配)，但是很少向中国一样利用大型基础设施工程(Khatiwada, 2009, Jimenez, 2009)。

书目

- Afonso J.R. et Dain S. (2009) Dos decadas de la descentralizacion del gasto social en America Latina : una evaluacion preliminar, **Working Paper**, Cepal, www.eclac.org
- Birdsall N. et Hamoudi A. (2002) Commodity dependence, trade and growth : when “openness” is not enough, **Working Paper n° 7**,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 Bradesco (28.12.2009) Em que medida o elevado deficit externo brasileiro em 2010 sera capaz de conter a apreciacao do real? **Destaque Depec**, n°104
- Cepal (2009):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ias de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 Cepal (2009) Tribucion directa en Mexico: equidad y desafio, **Macroeconomia del desarrollo** n° 91
- Dollar D. et Kraay A. (2000)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 Banque mondiale, **Working Paper**, www.worldbank.org/research.
- FMI (200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Crisis and Recovery**, chapitre IV, Washington.
- Galindo A., Izquierdo A et Rojas-Suarez L (avril 2010)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Foreign Banks in Latin America, How they impact the transmission of external financial shocks, **IDB Working Papers** n°116
- Goldstein M et Xie D. (2009)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Emerging Asia, in Working paper n°9-11,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Gomez Sabaini et Rossignoo D. (2008) Argentina, analisis de la situacion tributaria y propuestas de reformas impositivas destinadas a mejorar la distribucion del ingreso, **Working Paper**,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 Goni E., Humberto Lopez J. Et Serven L. (2008) Fiscal Redistribu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4487
- IEDI : **Carta Iedi** (2006), Brasilia
- Khatiwada S. (2009) Stimulus Packages to Counter Global Economic Crisis, **Discussion Paper DP/196**,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 Kliass P. et Salama P. (2008) La globalisation au Brésil : responsable ou bouc émissaire ? dans **Lusotopic**
- Ibara C.(2008) : El paradoja del crecimiento lento de Mexico, **Revista de la Cepal** n°95 n°95
- Jimenez JP (2010):Crisis, recuperacion y espacios de politica: desafios de la politica fiscal, **Working Paper**, Cepal
- Lopez-Calva L.F. et Lustig N.(2009) The recent decline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 Argentina, Brazil, Mexico and Peru, **Working Paper** n° 140, ECINEQ.
- Mathias G. et Salama P. (1983) **L’Etat surdéveloppé**, edition Maspéro-La découverte
- OCDE (2008) **Perspectives économiques de l’Amérique latine 2009**.
- OCDE (2009)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Western Hemisphere**, voir II° Partie :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Outlook
- OMC-OCDE (2009) **Globalisation and Emerging Economics**, Paris
- Palma G. (2005) The Seven Main Stylised Facts of the mexican Economy since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Nafta, i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14 (6).
- Rodrik D. (1995) Growth policy, getting interventions right : how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rew rich , **Economic Policy**, Manchester
- Salama P.(2006) **Le défi des inégalités, une comparaison économique Amérique latine/Asie**, La Découverte.
- Salama P.(2007) Pauvreté, le bout du tunnel?, Problèmes d’Amérique latine, n°66/67.
- Salama (2009a) Argentine, Brésil, Mexique face à la crise, **Revue Tiers Monde** n°

Salama (2009b) forces et faiblesses de l'Argentine, du Brésil, du Mexique, in **les Suds dans la crise** (sous la direction de Ph.Hugon et de P.Salama), Armand Colin

Salvatori Dedecca C. (2010) As desigualdades na sociedade brasileira, **Working Paper**, mimeo.

Titelman D, Perez-Caldentey E et Pineda R (2009) Como algo tan pequeno termino siendo tan grande ? crisis financiera, mecanismo de contagio y efectos en America latina, in **Revista de la Cepal**, n°98